

从“银贵钱贱”到“银铜皆贱”： 晚清通货膨胀层级特征演化研究

田 牛 袁为鹏

【摘 要】晚清中国处于传统向近代转型时期,通货膨胀同样具有过渡形态特点。铸币材料来源的多元化和各级政府对于发行权控制力差异,造成币种之间购买力变化的区别,构成通货膨胀层级性。咸丰朝币种购买力之间的背离和新政时期同向失速形成各自表征。表象化区别掩盖下的是货币政策对财政依附和传统货币思想主导地位。晚清通货膨胀层次性特征折射发行权力离散的状况和程度,在反映物价水平变迁之时深刻揭露中央政府对于发行权的失控。层级性则是货币权力外移和清政府对不同币种控制力差异的主要体现。它通过通胀为舞台将中央权力离散的危害性和传统货币制度、思想的落后性暴露无遗。

【关 键 词】通货膨胀;银贵钱贱;银铜皆贱;铜元

【作者简介】田牛,湖北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黄石 435002);袁为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上海 200240)。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23.5.170~17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明清以来我国传统工商业账簿史料整理与研究”(21&ZD078)。

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中,通货膨胀是一个重要话题。晚清通货膨胀则由于各种原因,学界关注程度较小。以往学术界对咸丰朝通货膨胀成因研究多集中于太平天国运动冲击,将其作为诱发的主要原因。彭泽益认为“主要是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战争时期滥发票钞和滥铸铜铁大钱引起的”。^①张国辉持有类似观点,并将鸦片战争的因素纳入考虑范围。“清政府在应付内外战争中消耗大量的战费,对外战争失败后又支付了巨额赔款,这些均成为国家沉重的负担”。^②杨端六则将咸丰时期币制改革的原因理解为“咸丰初年,太平天国成立,清朝财政更形匮乏,旧的货币金融制度实际上已无法维持下去”。^③各方观点共同之处在于,将咸丰时期通

货膨胀原因归为太平天国运动引起的财政危机。清末通货膨胀相关成果相对较少,彭信威《中国货币史》、^④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中有所涉及,^⑤但学界专门对晚清不同币种之间购买力变化趋势的专项研究偏少。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晚清币种购买力变化为切入点,揭示多元本位货币体系之下,清政府货币制度与思想局限性。

一、咸丰朝币种购买力相悖运行特征影响下的通货膨胀

国际白银减产诱发道光萧条,进一步减弱清政府应对社会危机的财政能力。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窘迫财政自然难以应对,清廷被迫选择赤字货币化政策。因币材定价、来源掌控能力差异,银质货币

购买力相对稳定,劣质货币价值迅速下滑,形成相悖走势。

(一)财政赤字货币化诱发下的无序发行

明代之后,白银成为中国货币体系核心。作为非产银国的中国,对币材供应缺乏必要控制权。19世纪初叶,拉美独立战争爆发造成白银产量下降,客观引发中国经济萧条。同时,西方国家同样遭受白银短缺困扰,为弥补贸易逆差转而向清朝出售鸦片,引起国内白银进一步紧缺,使中国经济不景气更加严重。在道光萧条影响下国家财政长期入不敷出。工部侍郎吕贤基采用中医口吻描述情势“譬之於病,元气血脉,枯竭已甚”,^⑥客观说明在传统视野中,清王朝活力丧失,财政、军事、社会出现全面危机。

由于军费骤增和库存空虚,战争之初清廷即陷入“筹饷维艰”处境。在“供亿浩繁”军费影响下,清廷财政已经“司道库藏,搜罗殆尽”。^⑦1853年8月,户部库存实银“仅存十万余两”。截止到明年(1854)上忙之前,应出各款460万两—470万两。祁寓藻预计各省上忙交付款项“为数仅及(额定)十分之二”。^⑧清政府军费“靡费帑金至贰仟数百万两”,户部已将“罗掘之方、无微不尽”,但依然“日不暇给、计无所出”。^⑨户部银库枯竭说明嘉道年间“虽有欠缺、尚可通融、虽非现银,尚可停待”惨淡经营的财政局面宣告破产,大钱等劣质货币发行成为“万分支绌之时……暂作权宜之计”。^⑩

在战争倒逼下,清中央政府要求各省立即推行大钱制度。中央对地方控制力、财政状况差别造成各地态度和措施区别。从货币流通规律出发,祁寓藻要求各省“设法速立官钱局……妥议章程,奏明立案”,^⑪明确要求各省仿效中央币制加快发行大钱、贱金属钱步伐,“以备该省留支等项之用”。京饷则继续采用白银为主,维持中央财政利益。地方政府在财政与政令压力下陆续铸造劣质货币,并随中央掌控强度有所差异。1854年,内地、边疆诸多省份将大钱余利作为弥补财政亏空重要工具,大钱铸造区域

出现由点向面扩展。

各级政府无序发行造成货币投放量骤然增加,战时经济环境货币需求有所降低,两者矛盾进一步加剧通胀危机。道光时期银贵钱贱,铸钱数量难以反映社会经济需要,如果按照乾隆时期解京铜额估计,每年约可铸钱168.8万串。^⑫咸丰三年(1853)后八个月所发钱钞达到1200万串,^⑬相当于正常时期7年发行数量。另据统计,1851年—1861年发行各种货币总量为6129万两。如按照1:2000银钱比价,折合制钱1225.8千亿万,平均每年1114.3万串,接近于正常需要总量的10倍。^⑭“货币增长率的变动影响通货膨胀升降,物价水平直接为货币供应量所左右”,^⑮货币总数过量发行必然引起物价上涨或变相上涨。由于晚清货币体系的特殊性,币值下降不仅表现为某种货币标记的价格上涨,而是体现为不同币材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和对其他币种的贬值。白银虽然作为一种货币,由于其保值性较高且供应量锐减,银计物价有所降低,则是此次通货膨胀的特殊性。

(二)劣质货币滥发冲击下的多元比价失衡

受白银供应数量限制,劣质货币滥发必然导致货币比价波动。关于咸丰时期银价,学界基本一致的观点是1856年—1857年为分水岭。^⑯整体而言,实行币制改革之后,银价呈现不断上升之势。然而,由于地方政府推行劣质货币步伐不一、西方介入程度差异等原因,银钱比价出现区域差异。新式货币投放初期,由于民众好奇心理和便于携带优势,对于银钱比价影响偏弱。1851年—1853年,北京地区比价由2100文—2200文涨至2400文—2500文,涨幅相对有限。1854年,大量劣质货币进入市场,银钱比价开始波动。劣质货币、铜制钱与白银比值出现不同趋势。北京地区每两白银合制钱2750文。^⑰如果按照政府开支的搭放方式计算,大钱、制钱混合体需要4000文兑换库平银1两。1855年,天津一带“银价日昂,民生日蹙”,^⑱银钱比价达到京钱7000余文。^⑲1857年,直隶官价规定官票每两京钱4000文外加六分补平,总计4240文。但是,直隶全境银价仅为京钱

3200文—3500文。^③按照官价要求缴纳钱粮则“民间未免苦累”。1858年9月,直隶银钱比价达到京钱1.2万文,相当于制钱6000文。咸丰九年约合京钱1.7万文。1860年—1861年,分别升至票钱3.8万文和6万文。^④铁大钱、纸币基本丧失支付功能。

1854年,河南银价涨至2100文—3000文,且因奸商操纵起落无定。全省“银价日昂,民生愈困,小民输纳税课,每苦于银贵而转运制钱又多未便”。虽然战争环境造成生灵涂炭,清廷亦承认“闾阎拮据之由固因逆氛未靖而总系为银价所累”。^⑤江苏一带因外国商人售卖制钱造成“银价骤落,钱价骤涨”,白银1两仅可换制钱1600余文,中央政府拨付400万两治河经费兑换制钱发放人工材料费后“只当三百万两之用”。^⑥尽管出现局部性反复,但银钱比价上涨整体趋势难以避免。1854年,江南地区银价由2021文涨至2400文以上。^⑦直至光绪二年(1876)于凌辰上折时,仍然强调内外银钱比价失调,^⑧造成货物运输不畅。

(三)购买力反向运动的层级性通货膨胀

清代实行银钱跛行本位制度,白银构成货币体系核心,“银价昂则物价不得不昂”,^⑨说明银价上涨将造成物价上升。由于金属货币购买力取决于发行数量、币材价格、单位货币价值等因素,造成币种之间购买力变化趋势呈现差异。伴随劣质货币投放,币种日趋复杂之时,层级通胀现象逐渐显现,“要看物价是根据什么计算……如果用银支付,物价应当有下跌的倾向……如果用铜(大)钱支付,则应当有上涨的趋势”。币材价格较高、额面金额与币材价值差距较小的货币具有保值性。咸丰时期通货膨胀问题突出,但是银计物价却呈现下降趋势,“白银的购买力,反而有增加的倾向”。咸丰朝每石米价1.99两,较之道光朝2.16两和同治2.27两为低,甚至低于嘉庆时期。太平天国运动高潮时期的1851年—1860年,每石大米价格降至63.72公分银,较之19世纪40年代降低25%。^⑩时人记录“百物虽贵,独喜银价之增,较诸用制钱之时,反有便宜”。^⑪铜制钱购买力

基本处于反复波动状态。19世纪初叶,每公石米价价值制钱3200文—3300文,太平天国前夕涨至3800余文。但是,战乱频发的1850年—1880年铜计米价降至每公石2914文。^⑫北京等地商业市场“行使大钱三成,即索价加三成”,^⑬客观说明制钱价值基本保持稳定。

在白银为核心的币制体系影响下,劣质货币对银贬值必然引起购买力降低。中央政府控制力较强的北京地区“百物翔贵,日用必须之物,较之当日,皆增价十倍”。^⑭此后经济形势更加恶化,以至于出现“旬日之间,民间日用之物骤见昂贵”。^⑮1855年,银钱比价达到京钱7000余文,“物价高低视钱(币种)为订”,民众“以当十大钱买物,每吊仅作(制钱)八九百文用”。^⑯咸丰七年,尽管当千、当五百等大面额大钱相继停造,当十、当五十等铜大钱继续投放市场。受货币挤压效应影响,物价涨幅更加迅速,“始则因铜当百、当五十大钱,物价为之增长,继则因铁当十大钱,物价又为之增”。^⑰京城附近秋收颇丰,政府官员预计粮价将有所下降。在经济规律的客观作用下竟然出现区域价格悬殊的情况。“京城以外,每斤麦面不过制钱十六七文,而城中则每斤至制钱三十七八文不等,一城之隔,价值增倍。(京师)食物翔贵”。^⑱京城麦价是京外2倍—3倍,表明北京正在成为典型的通货膨胀中心地带,大钱购买力降低到制钱一半以下。整体物价形势在劣质货币滥发作用下,情况更加严峻,“当十大钱,百般挑剔,当十钱,仅合铜制钱一文行用”。^⑲京城内外物价悬殊的事实迫使清廷最终发现“钱愈多则民愈不知贵”是造成京师物价“较外省多至数倍,米粮尤甚”的根本原因。^⑳咸丰八年,生活物资价格已经数倍于战前,物价形势“凡有一发莫遏,一唱百和之势”。^㉑既使官员生活也陷入拮据,“钱法之未善”成为朝野共识。^㉒

北京铜大钱购买力下降之时,地方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因靠近东川铜矿,云南大钱“核算铸本尚无大亏”。尽管云南货币政策相对稳妥,政府支出却以1:1800发放,形成暗中剥削,引起新制货币中仅“官

票及当十大钱俱各通畅”。^④云贵总督罗绕典被迫要求当五十以上大钱“酌量情形,再行加铸”。1854年7月2日,河南巡抚英桂制造大钱。未及半年,当千、当五百大钱“行用实多未便,且易启私铸之渐”。^⑤1854年8月,陕西大钱实际购买力迅速下降,银价“每两至三千钱内外”。受金属货币币材与面额特点制约,各种大钱价值“仅敷工本”,购买力和币材实际价格接近。1857年,陕西通货膨胀形势进一步恶化,大钱“以虚权实,民不知贵”,以至于未能流通。全省“民生日困,国用现在经费支绌已极”。^⑥陕西当千大钱选择价格较贵的红铜铸造,却依然“折当过多,民不见信”,“当五百、当千紫铜大钱行用尚形窒碍”,仅当百以下小面额大钱暂行流通。陕甘总督易棠力主小面值大钱增加铸造,当五百以上大钱“查看情形,再行酌量鼓铸”。^⑦

铜大钱毕竟属于传统币材改制而成,铁钱贬值更为迅速。咸丰八年初,京城地区每吊铁制钱兑换铜大钱3吊以上,春季1吊铁制钱约合2吊铜大钱,此后逐渐降低至1.2吊—1.3吊,年末仅为1000余文。^⑧1859年春,铁制钱与当十铜钱价值持平。五月则仅相当于当十铜钱数百文,且有逐渐不能流通的倾向,“即予乞丐,亦不肯要”。^⑨从铁制钱与当十铜大钱相对价格对比发现,劣质货币之间相对价值出现不同的变化走势。贱金属币种贬值速度甚至大于铜大钱。

1857年,直隶铁制钱出现“铸本危机”。省内拥有铁钱炉25座,虽然每炉每天可生产铁制钱5万枚以上,铸币收入却“所余无几”。如期望盈余只能寄希望于“经理认真,钱质精良,庶不至于赔累”。^⑩铁钱原料主要供应区之一的山西平定,因官员搭放铁钱造成该县“银两(即银价)物价较邻近各州县昂贵”。^⑪陕甘地区铁大钱“(1857)入春以后,壅滞异常”,^⑫群众“乐用铜钱而不愿铁钱”,当十铁大钱基本丧失流通市场。铁制钱和当五铁大钱“信用容俟查勘……再行添铸”。^⑬新疆伊犁拒收当百铁大钱,当地商人难以进货。大多数地方官员担忧“领钱未能

广用,而钱法遂为之不行,兵民即于兹交困”,^⑭造成社会动荡。库车等地大钱壅滞,制钱因私铸“日久缺乏”。大钱制度出现岌岌可危之势,“虽目下可行,实难望其经久。”^⑮

咸丰朝通货膨胀层级特点呈现为币种购买力波动异向性。清政府缺乏国际白银定价权,在劣质货币影响下,白银相对购买力稳中有升。随着财政赤字货币化规模扩大,尽管劣质货币单位面额有所降低,发行数量却水涨船高。铁大钱等贱金属货币甚至出现壅滞,以至于退出流通市场。贱金属货币与白银购买力反向变化表明,清政府对货币体系核心——银,掌控能力相对较弱,在国际银价和贵金属储存性能较强干预下,银质货币购买力受通货膨胀冲击偏小。贱金属货币扮演弥补财政亏空主要角色和通货膨胀承担者。受自身价值有限、面额过大、发行无序等因素影响,购买力持续下降。两者购买水平不同轨迹说明传统货币思想和货币权力流失对中国经济的消极作用。

二、国际银价下降与无序发行冲击下的银元贬值

清末白银购买力的下降始于19世纪末的银贱钱荒。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世界范围内金本位制度的确立,银价逐渐下落。19世纪初叶以来,困扰清政府的银贵钱贱逐渐转化为银贱钱荒,货币问题的中心再次回到制钱方面。国际银购买力的下降从海关两对外汇汇价、银与紫铜价格对比、金银比价的变化趋势中得到体现。光绪元年(1875)之后,金银比价开始剧烈下降,1875年为1:16,1894年突破1:30大关,1900年降至1:32.3。1909年跌落1:40以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银对金跌价49.7%,铜对金跌落26.6%,银对铜价值出现降低趋势。1875年,紫铜每担价格16海关两,1894年达到20两,1899年骤增到30两,1902年达到峰值36两。^⑯中国属于用银国,国际银价低水准徘徊必然引起国内银计物价上涨。光绪时期,每担粮食价值2.17两,宣统朝达到4.04两,^⑰涨幅接近90%。指数统计显示,1905年米价指数为131.55,1910年升至218,辛亥革命前夕

的1911年提高到243.57,^⑤七年中增加84%。数据表明清末新政时期物价发生较快上涨,通货膨胀趋势日益明显。

国际银价下降冲击之时,银元财政性发行构成物价上涨另一推手。甲午战后,张之洞决定发行银元以弥补制钱不足。1894年,清政府发布上谕“南北洋沿海繁庶地方,如能招商集股,官督试办,实可以济闾法之穷”,^⑥事实上承认各省发行权力合法性。在中央的首肯下,地方政府开始鼓铸银元。如1896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在江宁开设铸币厂“仿铸银元,兼铸制钱”。^⑦截止到1900年,广东、直隶、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等省铸造银元,云南、新疆、西藏等边远省区紧随其后。因缺乏中央统一调配,各省之间投放数量迅速增加,广东每年向货币市场投放2000万枚以上二角银洋。福建、江苏则分别发行二角银元138万枚和7000万枚。^⑧

光绪十六年到三十四年,各省上报数据显示铸造大银元数字为“四十余兆,小银元一千四百余兆”。^⑨虽有中央政府监理官坐镇,但仍然难以避免少报情况发生。民国四年(1915)财政部调查全国17处造币厂铸造情况,一元银币2.06亿枚,五角3227.9万枚,二角五分114万枚,二角12.32亿枚,一角2.35亿枚,五分517.4万枚,共计价值4.9278亿元。^⑩民国初建,银元发行数量有限,大部分当为清代铸造。

各省擅自发行之时,银元价值开始下降,每万元铸币税收益降至210两。^⑪银计物价逐渐上扬,各地涨幅基本在15%—50%之间,最高为100%—150%。^⑫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浙江龙游春笋涨价2.4倍,其余蔬菜提价3倍。大米每担由3银元涨至4银元,涨幅约为33%。小麦价格由每石2.2银元升至2.5银元,上涨13.7%。^⑬安徽、湖北等省银元“一文不值”。^⑭经济相对发达的长三角地区银计物价出现增加走势。1902年,南京每担米价约为3.5银元—6银元。1903年增至4银元—6银元,1907年则为7银元—8银元。镇江每百斤米价格十年之中上涨30%,

达到4银元。1902年,苏州每担米价为4.1银元,1910年达到7银元。同时期菜籽由2.9银元增至4.1银元,增加60%。1902年,杭州每担好米价格5.5银元,此后增至6银元—7银元,辛亥前夕为7.3银元,“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⑮辛亥前夜,宁波每石米售价8.5银元,1901年售价不超过5银元。劈柴和鱼肉分别增加50%和80%,猪肉价格增幅达到120%。^⑯经济重镇苏州“外省所铸龙元多方抑勒,或须贴水或竟掷还小银元,凡福建、安徽所铸者概不行用”。江苏官府规定各省银元平等流通,然则在成色、重量差异影响下,扬州等地市场贸易“湖北所铸须折耗数十文,他省所铸更多方挑剔”。民众交易“(银元)多方挑剔,小民转受其亏”。^⑰

1900年—1910年,四川南溪银计物价整体上涨,最高的棉花涨价150%。丝织品涨幅在25%—70%之间。燃料加价空间位于20%—60%之间,最低牛油烛11%,最高枵柴100%。1910年与1893年相比,湖南醴陵生活物价增加率普遍超过50%,其中谷物和茶油分别提高2.5倍和2倍。^⑱宣统年间,北京地区主要食品价格普遍上扬,白面每百斤上涨1.02两、小麦0.3两,各种米基本在0.9两以上。^⑲清末10年,华北地区主要食品价格几乎无物不涨。最高青菜为10倍,平均增幅为50%以上。宣统年间,白银购买力降低速度更快。山东烟台小米和玉蜀黍物价增速达到60%—70%,花生油和豆油则为50%—70%。^⑳从各地区物价变化情况分析,白银国内购买力呈现持续性下降走势。白银属于贵金属,铸币收入相对有限。伴随铸币税收收入较高的铜元出现,银元进入次要地位。

三、“银铜皆贱”:铜制货币滥发与白银贬值影响下的购买力同向异速降低

在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清末中国货币购买力遇到较大挑战。内受财政危机和铸造权分散压力,外有国际银价持续下降冲击。在财政困境压迫下,地方政府选择铜元余利弥补财政亏空,诱发无序发行和铜制货币购买力减低。与白银相比,清地方

政府对于铜元具有较强控制力,限制发行因素较少。在发行权下移历史格局下,各省铜元滥发严重,辅币职能有所削弱。

尽管长时间钱荒和清末新政客观扩大铜元市场。然则,当无序发行超过经济承受临界点之后,贱金属货币购买力陷入下降周期。铜元贬值体现在对银比价下降和购买力降低。铜元本质属于贱金属货币,保值功能相对较弱。发行初期,因长时间钱荒,暂时取得溢价流通。地方分别铸造,中央事实放任的发行体系表明铜元尚未完全取得辅币地位,存在实币化隐患。

1900年,张之洞“创铸当十铜元,是为中国流行铜元之始”。^①因为铜元余利较之银元丰厚,各省很快出现“铜元热”。在钱荒的大环境下,光绪帝发布上谕,要求沿海、沿江各省普铸铜元。^②福建、广东、江苏等铸造较早省份,按规定数量解交京师,中央政府事实承认地方发行权。

财政亏空、制约偏弱等因素影响下,铜元相对丰厚的铸币收入形成较大诱惑。根据时人计算,每铸造百万枚铜元,盈余在79万两以上。^③地方政府获得制度授权后,将铜元作为弥补赤字良药。光绪末年,全国已有12省设15处铜元厂。各省因“利之所在……于是争先恐后,百事废置。而惟铸铜元为要务”,铜元余利使“各省财政忽加腴润”。^④户部数据进一步显示,“已开铸者已有十七省,设局多至二十处”。^⑤铜元制造核心省湖北拥有3厂,共计铸造铜元42亿枚。^⑥1908年,湖北投放铜元4.96亿枚,^⑦若按照百万枚盈余77万两计算,财政收入应为5250万两。江苏2厂发行总数约价值90亿枚当十铜元,^⑧所造铜元基本投放市场。1902年,安徽造当十铜元876.6万枚,当五铜元7060枚,折合制钱8767.5万枚。1905年,安徽当十铜元投放数量约合16.05亿枚制钱,1906年进一步增加到17.26亿枚。^⑨在各省铜元滥铸情况下,铜元通货膨胀效应逐渐显现,“供过于求,价值一落千丈”。^⑩

1900年—1902年,北京地区银元、铜元比值分别

为76、83.2和87.6,直到1906年依然低于1:100的官价。^⑪1903年,江苏“铜元……仍未足全省之用”,^⑫每枚银元仅可兑换铜元80枚—88枚。^⑬长三角主要城市实际交易“在市面竟加升水自百分之五至十五不等”,^⑭表明铜元比价约为1:80—1:90。1905年—1906年,铜元“供给远过于需要,而价值遂一落千丈”。^⑮全国范围内铜元价格迅速下降,滑落至官价之后继续走低。1905年“六月换九十六枚……其年末换一百零七枚”标志兑换价降至官方价格以下。^⑯安徽等省“(光绪)三十一年铜币充斥”。^⑰1907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呈现“铜圆益多,制钱益少,铜圆一枚不足抵制钱十文之用”的严峻形势,^⑱铜元和银元比价降至1:120。^⑲直隶地区“银价增高物价翔贵而铜币日益低落……库平银一两合当时铜币一百数十枚”。^⑳苏州等地“近来银价日昂,钱价日贱。每库平银一两兑铜元一百八十余枚,龙洋一元兑一百二十余枚,仍有加无已,实于大局有妨”。^㉑宣统年间,铜元进一步跌价,“遂至每银一元换铜元百八十枚,今年(1910)一年内,大率来往于百七十五枚至百八十枚之间”。^㉒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大部分地区银铜比价降至1:134—1:171,^㉓较之官方价格下降30%—70%。各种货币兑价的不同必然在购买力方面有所反映。

铜元本质属于货币,在对银质货币比价的同时,本身具有支付功能。铜元价值不仅体现在银铜币比价,而且还需分析其对于物品的交换。“清末最后十年间铜元滥发,最直接的影响是给即已上升的物价起了催化作用,增加了物价上涨的速率和速度……粮价陡涨和当日货币特别是铜元供过于求息息相关”。^㉔在银计物价以不到一倍速度增高之时,铜计价格基本以一倍、二倍甚至三倍以上高速增长。银计物价整体落后于钱计价格的变动,层次性较为明显。

由于铜元购买力持续下滑,民间采用币材价值和供需情况自行调节比价。铜元逐渐出现折价流通,“(铜元)昔仅值制钱三四文者,今且涨至

五六文……当十不过名称上之虚数,是以铜元之所谓十文,力量薄弱于制钱十文……以制钱付价较铜元减至七八折”,表明铜元因滥铸贬值。《申报》形象分析银铜比价失衡导致商人被迫涨价,“进货均以银计或用两或用元,而市交易则以钱计。银贵钱贱之际出入相抵,所耗甚巨……人民生计大受影响”,“铜元充斥,物价飞腾……一枚洋兑铜元千文,所进货物值洋一元,即制钱千文,三月二枚洋兑铜元一千一百文,其售出之钱码每洋一元折阅百文,于是不得不相率加价……今钱串入是飞增无已,其无形之加价甚于有形”。^④银价尽管呈现下降趋势,但地方铸币的无序,造成铜元价值降低更快。

1905年之后,铜元贬值速度加快,由溢价交易变成折价流通,降低速率超过白银。虽然商品零售价格受供应波动,政治因素(如米禁)等方面影响导致币种间价格互异变化。但是,当大多数地区、商品钱计物价高于银计之时,可以推测铜质货币购买力降低幅度更快。1900年—1910年,四川南溪、合川等地区银计丝织品价格平均增幅25%,其中杭缎、倭绒等少数品种出现下降。以银为单位的建筑材料增速相对较慢,木料保持在25%左右,方料则维持1两不变。辅料中竹料等材料涨幅为25%。生活布料银计价格10年中增幅较缓,纱、宁绸、葛布维持不变。白绸、麻布、丝等主要纺织品价格增加约20%—25%,只有山丝绸增长100%。同时期,合川县铜计物价中煤炭则由240文增至1200文,涨幅为500%。增速较缓的木炭、桐油分别达到44%—48%。1905年—1911年,南川县铜计食物价格增速平均达到30%以上,最快的烧酒由40文增至100文,增速为150%。生活物资中白布价格增加100%。南溪县除棉布增长13%之外,其余丝织品、棉纺织品价格涨幅均大于30%,最高的棉花达到150%。^⑤临近四川的重庆,1905年“数年前之斗米之价,只七百蜻蜓(地方铜元),此时加过一倍矣”。^⑥

另一经济中心珠三角情况同样危机。1902年—1911年,广州、潮汕地区每块银元购买大米数量由25

斤降至15斤,薪柴则由180斤减为100斤。10年中单位银元相对大米和柴薪购买力分别下降60%和40%。盐和花生油每斤价格分别增加2分和1角,涨幅为40%—67%。新会江门银计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工人工资增加百分之二十”。^⑦与此同时,铜元价格贬值大于银元。汕头铜计米价增加75%—100%,米柴和木炭增速为150%。三都澳价格涨幅被“认为百分之八十并非过高估计”。广东佛山使用铜元后“物价之日昂有以致之”,^⑧增速应该超过50%。

通过对比发现,大部分地区钱计物价增速快于银计物价。在银计物价以1倍左右速度增长之时,铜计价格则以1倍—3倍速度增加,铜元购买力较之白银降速为快,层级性特征初露端倪。清末时期,地方政府铜元滥发与国际银价持续下滑,中国银计物价与钱计物价持续走高,出现“银铜皆贱”现象。两项物价变化中银计物价增幅慢于钱计物价,随着时间推移两者差距日益明显形成新层级性。这种特殊经济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货币权力的下移与外移。币权下移造成中央政府对货币发行的有效控制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削弱。在地方因财政需要过量投放之时难以有效调节。外移则体现为中国政府缺乏对货币体系核心——白银,供应权和定价权的影响。当国际情况稍有变化之时,国内物价随之波动,造成通货贬值,形成币种之间购买力变化不同的层级性。客观说明清末货币已经出现体制危机,枝节改革无济于事。

四、结语

清承明制影响下,清政府继续采用金属货币体制。金属货币购买力受到币材供应、面值、运输路线、币材价格对比、发行数量等诸多方面影响。银、铜并行的货币体系,币种比价在官价之外,按照市场规律波动,客观形成相对独立的货币分体系,构成各自发展趋势。清代中国特殊的货币制度中,白银购买力受制于国际因素和银制货币发行量。在缺乏白银产量和定价权的清朝,中国对白银货币影响

力受到一定局限。尽管东南沿海地区长期依靠进口铜料,但是滇铜的存在和铜货币化非国际性特点,造成清廷对铜制货币控制能力强于银制货币。不同货币种类在币材、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造成发行数量、铸币税收的区别,最终在购买力方面呈现互异趋势。

不同币种购买力变化是清政府执政理念、币材控制权、财权分散的综合反映。咸丰朝层级通胀主要因为政府无序发行。由于清廷货币政策缺乏协调和财政性发行政策确立,劣质货币购买力持续下滑。多数主要国家金本位尚未确立,白银生产初步脱离拉美独立战争影响,国际银价相对稳定。依靠白银输入维持货币供应的中国,国际银价对银计物价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货膨胀发生后,银计物价稳中有升,物价涨幅主要体现于劣质货币。白银货币价值始终保持平稳,按照米价为标准计算甚至较道光朝有所下降。在国际、国内因素共同作用下,币种价值呈现相悖运行。

清末原因则更加复杂,由较为单一的单向推动变为多元动力。国际性货币制度变革成为银计物价上涨的主要推动力,地方政府无序发行铜元构成国内货币贬值的推手。清地方政府对不同币种控制、影响力差异成为层级通胀的重要原因。新政时期,币种间通胀率差异化本质是币权分散在物价方面的反映。清朝各级政府对白银供应、定价缺乏必要的发言权,唯有在银价波动之时作出被动反应。因国际范围内金本位的采用,白银价格的跌落造成中国物价转折,是货币权力外移的有力体现之一。虽然这种转移并非完全武力胁迫结果,但对于经济影响则是无差别的。国际银价长期低迷诱发中国银质货币贬值。在供过于求的大走势下,白银价格渐下滑,银对贵金属金和主要币材铜相对价值开始降低。和货币理论相悖的是,银对铜贬值之时,银贵钱贱再次发生。较之白银,地方政府对于铜元控制力较为强大,铜计价格获得较之银计物价更快的降落速度,构成另一种层次性。清末通胀形成银铜货币共同贬值

的同向运动,本质是中国货币权下移、外移水平差异化的经济考量。

任何一个国家货币购买力相对稳定是政权稳固、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先决条件。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币值变动对改革成败具有决定性作用。清政府变革货币体制、政策与财政危机始终呈现正相关的互动趋势。仔细分析两次通货膨胀爆发原因皆存在金属货币特点和政府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身影,客观说明清政府治国思想和货币制度近代化纵向进步之时,与时代发展需要存在脱节,最终制约政府应对危机能力和清末新政改革成效。

注释:

①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7页。

②张国辉:《晚清财政与咸丰朝通货膨胀》,见《张国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65页。

③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91页。

④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76页。

⑤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85页。

⑥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703页。

⑦江西巡抚耆龄:《报收捐铜斤价银事》,咸丰八年二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档案号:04-01-35-0689-013。

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6页。

⑨刑部尚书周祖培:《为广储铜斤增印鼓铸以充国用而济经费事》,咸丰三年二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档,档案号:03-4463-025。

⑩福建道监察御史宋延春:《报筹借商银请敕部派员劝谕事》,咸丰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档案号:04-01-35-1386-027。

⑪戴瑞征:《云南铜志》,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49页。

⑫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10页。

⑬祁寓藻:《请收回当千当五百大钱还给宝钞》(咸丰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65页。

⑭彭泽益:《1853—1868年中国的通货膨胀》,见氏著:《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5页。

⑮米尔顿·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杨培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⑯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王宏斌:《晚清货币比价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⑰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

⑱陕西巡抚王庆云:《报试行官票筹议分成搭放兼用大钱制钱以期流通事》,咸丰四年二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档案号:04-01-35-1369-040。

⑲曹登庸:《请严禁私铸》(咸丰五年十二月初四日),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314页。

⑳两江总督陆建瀛:《为兴举大工银价骤落钱价骤长请印票代钱事》,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档案号:03-4463-016。

㉑于凌辰:《当十大钱价贱银昂请复制钱》(光绪二年十月初六日),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515页。

㉒河南巡抚英桂:《为豫省钱粮各款征收实银五成并请搭交官票制钱事》,咸丰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档案号:04-01-35-1369-052。

㉓两江总督陆建瀛:《为兴举大工银价骤落钱价骤长请印票代钱事》,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藏录副奏折档,档案号:03-4463-016。

㉔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第173页。

㉕于凌辰:《当十大钱价贱银昂请复制钱》(光绪二年十月初六日),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515页。

㉖刘梦兰:《请严禁运银出口》(道光十七年六月初三日),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26页。

㉗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77、606、602、601页。

㉘署刑部右侍郎袁希祖:《大钱滞碍难行亟宜改铸制钱规复旧制》(咸丰九年四月十九日),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301页。

㉙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552页。

㉚席裕福、沈师徐:《皇朝政典类纂》,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第9页。

㉛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2页。

㉜李培祐:《当十大钱跌价请严查办》(咸丰六年十一月初十日),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279页。

㉝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52页。

㉞御史忻淳:《银价增长物值昂贵兵饷请加发铁制钱》(咸丰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298页。

㉟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刘泱泱等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677页。

㊱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52页。

㊲保恒:《铜当十大钱壅滞请发铁制钱》(咸丰七年七月十六日),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287页。

㊳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52页。

㊴征麟:《行使大钱铁钱后百货腾贵异常请饬严限物价》

(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298页。

④云贵总督罗绕典:《奏报滇省试行官票及当十大钱并各府铸钱情形事》,咸丰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档案号:04-01-35-1370-004。

④河南巡抚英桂:《报筹议设局鼓铸大钱章程事》,咸丰四年十二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档案号:04-01-35-1370-025。

④陕西巡抚王庆云:《银少价昂请以黄金红铜辅银三金并用事》,咸丰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档案号:04-01-35-1370-009。

④陕甘总督易棠:《报甘省设立官钱铺及试铸大钱行用情形事》,咸丰四年六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档案号:04-01-35-1369-055。

④征麟:《行使大钱铁钱后百货腾贵异常请飭严限物价》(咸丰八年四月十六日),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第298页。

④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52页。

④署理直隶总督谭廷襄:《议推行大钱钞票章程并于天津等府设局铸钱事》,咸丰七年闰五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档案号:04-01-35-1371-004。

④翁信存:《请究办山西阻滞铁钱之官吏士绅》(咸丰八年十一月初六日),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299页。

④潘颐福:《咸丰朝东华继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300页。

④陕甘总督易棠:《报甘省设立官钱铺及试铸大钱行用情形事》,咸丰四年六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档案号:04-01-35-1369-055。

⑤伊犁将军奕山:《报续获铜铁加铸大钱抵饷并议通行内地事》,咸丰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档案号:04-01-35-1370-005。

⑤叶尔羌参赞大臣庆英:《奏请变通改铸大钱并节省铜斤多抵经费事》,咸丰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藏录副档,档案号:04-01-35-1371-011。

⑤张家骥:《中华币制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⑤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602页。

⑤彭凯翔:《清代粮价的解释与再解释》,第175页。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545页。

⑤财政部钱币司编:《币制汇编》第1册,北京:财政部钱币司,1919年,第217页。

⑤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清末新货币的发行机器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62本第3分,1993年。

⑤度支部:《筹拟旧铸银铜各币办法以维币制折》(宣统二年四月),见财政部钱币司编:《币制汇编》第1册,第230页。

⑤柳治徵:《中国文化史》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855页。

⑩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2册,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整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卷,第1074页。

①戴鞍钢、黄苇:《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158、827-828页。

②戴鞍钢、黄苇:《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第827页。

③《禁抑龙银》,《申报》1899年12月19日。

④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69-272页。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5页。

⑥《禁抑龙银》,《申报》1899年12月19日。

⑦戴鞍钢、黄苇:《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第834、829页。

⑧陈璧:《望岩堂奏稿》上,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年,第221页。

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69-272、584页。

⑦耿爱德:《中国货币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416页。

⑧杜宏春:《陶模行述长编》下,合肥:黄山书社,2019年,第1301页。

⑨《铸铜元本利简明表》,《东方杂志》第2年(光绪三十一年九月),第9期。

⑩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国风报》第1年第5号,第679页。

⑪奎濂等:《奏请限制各省鼓铸铜元整齐币制片》,《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第339页。

⑫国家图书馆:《度支部试办宣统三年预算案总表》,《清代民国财政预算档案史料汇编》第5册,北京:中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第2115页。

⑬《度支部奏准核销湖北造币厂银钱收支数目折》,《政治官报》第980期,1910年。

⑭国家图书馆:《度支部试办宣统三年预算案总表》,《清代民国财政预算档案史料汇编》第5册,第2115页。

⑮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第376页。

⑯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第679页。

⑰甘博:《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孟天培、李景汉译,《国立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26年第2期。

⑱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3册,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整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9卷,第1554页。

⑲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第45页。

⑳耿爱德:《中国货币论》,第390页。

㉑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679页。

㉒马士:《中朝制度考》,第127页,见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357页。

㉓冯煦主修,陈师礼总纂:《皖政辑要》,第375页。

㉔御史吴伟炳:《黑龙江钱帖弊端》(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三十日),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1003页。

㉕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第45页。

㉖直隶总督袁世凯:《奏为津埠银根紧缺请暂停铸造铜元由外省代铸等事》,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档,档案号:03-6685-073。

㉗《苏抚与江督往来电文一陈启泰致端方电》(光绪三十四年),见章开沅等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1905-1911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180页。

㉘梁启超:《各省滥铸铜元小史》,第45页。

㉙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清末新货币的发行机器影响》。

㉚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清末新货币的发行机器影响》。

㉛《论再铸铜元之害》,《申报》1908年8月18日。

㉜戴鞍钢、黄苇:《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第837-838、840-841、832页。

㉝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603页。

㉞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90页。

㉟戴鞍钢、黄苇:《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第830页。